

# 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比较研究

任东升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 佛经翻译和圣经汉译在中国均有悠久的历史, 两者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宗教经典翻译发生论入手, 探讨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在翻译实践上的相似性以及两者产生差别的历史文化原因, 指出佛经翻译带有“使节文化”特征, 圣经汉译带有“征服文化”色彩, 佛经和《圣经》在中国文学认知语境下都得到了诗意阐释。

**[关键词]** 圣经汉译; 佛经翻译; 比较研究; 使节文化; 征服文化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08)03-0046-05

## 一、引言

基督教的《圣经》和佛教的经典都是作为宗教文化传入中国的, 圣经汉译和佛经翻译都历时千年之久, 与中国的政权更迭和统治阶级有着价值趋同和价值冲突的波动, 呈集体翻译之盛, 促进翻译高潮的形成, 可以说投入相当, 规模相当, 影响相当, 构成中国翻译史上两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或运动。蒋述卓(1990)评价佛经的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 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 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翻译。”(转引自王克非, 1997: 44)这个观点是基于对佛经文本自身具有的宗教、哲学、文学三维性质的首肯。从某种程度上看, 圣经汉译活动也具有类似特点, 因为《圣经》也具有三维性质, 它既是充满哲理的基督教经典和记录古希伯来民族历史的珍贵文献, 又是一部写作技巧高超的文学作品。此外, 作为一种“文化母本”, 《圣经》既是生活和思想的“百科全书”, 也是一个审美文化的“资源库”(刘洪一, 2004: 235-237, 341)。《圣经》经过无数中西人士前赴后继的诠释、翻译、修订, 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拟从宗教经典翻译的发生论入手, 探讨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上的相似性以及两者产生差别的历史、文化原因。

## 二、西方圣经翻译与中国佛经翻译之比较

基督教之《圣经》、佛经之《大藏经》等宗教经典是民族信仰和地区文化的最初文字形态, 代表其发源地的民族精神和灵性智慧。宗教的生命在于传播, 让更多的人接受, 因此, 宗教典籍的翻译历来是宗教机构或政教合一国家统治者的一件大事。中外翻译史告诉我们, 人类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是以大部头的宗教经典翻译开始的。

西方翻译史肇始于地中海东部文明, 圣经翻译贯穿西方翻译史六大阶段, 并演变为一“主线”(谭载喜, 2000: 4)。西方的圣经翻译基本上是在印欧语系中的跨语言转换, 在丰富的圣经翻译、重译实践中涌现出哲罗姆、廷代尔、伊拉斯

莫、坎贝尔、奈达等杰出圣经翻译家和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Bassnett, 1995)观察到, 圣经翻译以及奈达这些当代翻译家的理论表述, 正是当今很多译学理论的基础。奈达把西方的圣经翻译总结为三种途径: 语文学途径(The Philological Approach)、语言学途径(The Linguistic Approach)和交际学途径(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参见 Metzger and Coogan, 2002: 494-497)勒弗威尔(Lefevere, 1998)则把西方的圣经翻译史划分为“神学性翻译(theological sphere)”和“非神学性翻译”两个阶段, 以14世纪兴起的民族语言圣经翻译为界。非神学性翻译的策略与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相似, 尽管首要目的依然是通过翻译《圣经》传播基督教, 但从客观效果看, 目的语文化中的非教徒读者会从自身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认知模式出发, 倾向于把语言优美、表达通俗的《圣经》当作一部文化大书和文学名著来阅读。(《圣经》在中国大陆非教徒读者中的接受就是如此。)

西方的圣经翻译有三个特点: 一是源远流长, 围绕《圣经》文本诠释权和翻译权的垄断和反垄断斗争, 圣经翻译同西方文明进程和文化发展一直存在密切关联, 被称为“西方文化历史的缩影”(Bassnett, 2004: 51)。二是翻译实践与对翻译理论的探索几乎同步进行, 圣经翻译理论基本上为维护《圣经》文本的宗教权威和传播《圣经》服务, 缺乏从“文学翻译”角度审视圣经翻译的传统。三是《圣经》译本功能多样化, 到了当代, 呈现出为宗教传播、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等不同目的的翻译趋势。

西方的圣经翻译和中国的佛经翻译当然有差别, 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 西方圣经翻译有“一语多译”的传统, 促成了多种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成熟, 因而带有世界性特征; 佛经翻译的中心在中国, 限于从梵语或胡语到汉语的转换, 汉语从中受益良多, 地区性特征明显。

其次, 西方圣经翻译历来与民族集团和宗教政治的需要密切相关(Bamstone, 1993: 186)。由于《圣经》文本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 《圣经》解释权、翻译行为与教权、政权的关系

[收稿日期] 2007-12-18

[作者简介] 任东升(1966-), 男,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和《圣经》翻译。

复杂多变,因而出现了版本不同、译事受挫、译家遭难的现象,译者甘愿埋没其名,不求地位;佛经翻译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进行得基本上十分顺利(除唐武宗灭佛事件),皇室政权对佛经翻译比较支持,中外译家的社会地位很高。

第三,西方圣经翻译以“输出”为主导策略,策动者和赞助人在源语文化一方,带有“征服文化”的色彩,符合基督教征服全球、万民归一的普世目的;佛经翻译以“输入”为主导策略,策动者在目的语文化一方,带有“使节文化”的意味,符合佛教对主体悟性的倚重。

最后一点,西方圣经翻译张扬基督教文化,在基督教国家,宗教性始终被尊崇为《圣经》文本的主导性价值或首要价值;佛经翻译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哲学及美学结合,“儒佛调和”(汤一介,2002:404),哲理性 and 文学性被尊崇为汉译佛典的主导性价值或首要价值。

### 三、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的相似性

“翻译是目的语文化里的事实”(Toury, 2001: 29)。圣经在中国的译介始自唐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迄今已有13多个世纪的历史。圣经汉译活动既是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一个主要分支,又是中国翻译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唐代,处于兴盛期的佛经翻译和处于肇始期的圣经翻译平分皇帝的恩荣,甚至出现过圣经译介者景净和佛教徒般若共译佛经之举。(黄夏年,1996)来华传教士面对中国的特殊文化和时代背景,他们也在探索圣经汉译的有效形式和方法。唐代的景教徒借用现成的佛、道概念,主要是为了基督教教义的“本土化”。18世纪末,贺清泰翻译《古新圣经》时,虽然遵循西方传统的逐字译法,注重《圣经》的“本文本意”(贺清泰《圣经之序》,参见徐宗泽,1949:19),但也开始考虑读者的接受。到了19世纪,马礼逊对翻译有了独立的思考,他追求忠实、明达和简易(fidelity, perspicuity and simplicity)的翻译语言,向往忠实、明达、地道(能做到典雅更好)(faithfully, perspicuously and idiomatically,参见Strandenaes, 1987: 44)的译文。这一见解类似70多年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杨格非反对“逐字(ad verbum)”式的翻译,认为那样做只会曲解原文的意思。他认为“忠实的译文在乎保留原作者的意思,并将它表达出来”(转引自赵维本,1993:23)。他提倡翻译“意义”(ad sensum,转引自尤思德,2002:159),即翻译原文的意思,采用灵活的译语形式。这一思想在实质上与奈达的“动态/功能对等(dynamic/functional equivalence)”相似。“官话和合本”译委会制订的四条翻译原则中有一条“译文字句必须忠实于原文,同时又不失中文的文韵和语气”(转引自赵维本,1993:37)。中国翻译家朱维之(1941:79)通过用“骚体”翻译《耶利米哀歌》的实践,提出了根据不同文类风格采用不同体裁的翻译设想,具有先见之明。这说明中国翻译家对《圣经》文本的看法是基于文学的,而不是宗教的。继朱维之之后,吕振中提出了“信达雅兼筹并顾”和“信达雅之均衡运用”的“折衷途径”(吕振中,1946)。第一本由华人圣经学者集体直接由原

文翻译的圣经——《圣经新译本》(1992)则贯彻“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自称为“兼具信、达、雅果效的佳作”(1999年第二版“序言”)。

圣经汉译活动和佛经翻译运动一样,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国语言文学。梁启超(1924)、周作人(1921)、郭沫若(1947)、闻一多(1982:204)、董秋斯(1951)、季羨林(1997)、朱维之(1995)等都曾从不同角度对两者加以比较。全面来看,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的共同之处有如下几点:

首先,两者在翻译实践上有诸多相似点:(1)佛经和《圣经》都是通过沟通西域和中国的“丝绸之路”由西域人士传来;胡人和天竺人传入佛教;胡人、犹太人和波斯人传入《圣经》(1)。(2)最初译作的性质均为“撰本”而非“译本”。按照梁启超(1924)的看法,最早的汉译佛典《四十二章经》“非惟文体类《老子》,教理亦多沿袭。此类经典,掺杂我国固有之虚无思想,致佛教变质,正所谓被水之葡萄酒也。”因此“乃撰本而非译本也”(梁启超语,转引自翁绍军,1996:36)。现存最早的圣经汉译片断《序听迷诗诗经》乃“补缀新旧两约圣书之文”(朱谦之,1993:118)。(3)从语言媒介的更迭上看,圣经汉译和佛经翻译都经历了“口头传译—转折翻译—直接翻译”三个阶段。东汉的佛经先从胡本转译,隋代以后从梵文直接翻译;圣经汉译先从(唐朝)叙利亚文、(明清之际)拉丁文、希腊文、(19世纪)英语转译,后从希伯来文、希腊文直接翻译。(4)翻译主体都经历了“外国人主译—中外人士共译—本国人主译”的更替。(5)两者最大的相似点似乎表现在对“汉语文化所固有形式”(Lefevere, 1992: 22)的追求上。晁无讖、鸠摩罗什、玄奘等用五言句翻译佛经诗歌(2),李荣芳(1931)、朱维之(1941:1992)、吴经熊(1946)用“骚体”翻译圣经诗歌的例子都说明,中国的诗学传统对外来宗教经典翻译的强大制约作用。

其次,两者在翻译理论的探索上经历了三个相似的发展过程。佛经翻译理论的发展可概括为:“案本—中道—圆融”三个阶段(赵秀明,2004);圣经汉译理论的发展可概括为“本文本意—意义忠实—信达雅兼备”三个阶段(任东升,2006),从“源本中心”转向“读者中心”,从而完成了从“神学性翻译”到“非神学性翻译”的过渡。佛经翻译奠定了中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中西圣经译者对圣经汉译理论的探讨,丰富了外译汉翻译理论的宝库,也为文学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三,汉译《圣经》和佛经在中国文学认知模式下均被接受为“翻译文学”。从文本的主导性价值上看,两者都是宗教经典,但是经过翻译这个跨文化过程和教义“本土化”过程,佛经和《圣经》自身的文学价值凸现出来。作为译本接受者,对宗教没有执着追求的中国文人常常以文学家的眼光去披阅教经,他们看重的是教经里所流露的宗教感染力、民族想象力和文章文采。这一独特的读经传统构成了中国文人对佛经和《圣经》特有的认知模式。梁启超(1989)曾云:“一切佛典皆文学也。”又说(1924):“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写。社会上人人嗜

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绩”。在周作人(1921)眼里,《圣经》“和中国的四书五经相似,在教义上是经典,一面也是国民的文学。”郑振铎(1924)认为,《旧约》是希伯来民族在千年间所产生的“最好的文学”,就连《启示录》也是“很美丽而很有力的著作”,因而把《圣经》纳入他编的《文学大纲》。陈玉刚(1989:26)认为来华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也可以说是我国翻译文学的一种。”当代以色列圣经学者伊爱莲(2003:5)指出:“翻译出来的圣经不只是一部宗教典籍,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她还从中国现代作家频繁引用圣经内容的现象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意味着圣经主要是被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阅读。”换言之,在中国现代文学认知模式下,《圣经》原来的主导性价值和非主导性价值发生了转化,《圣经》自身的文学品质被接受为主导性价值,而其宗教功能则被一再淡化。

最后,佛经翻译和圣经汉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贡献。佛经的翻译使中国古代文学获得一种解放,佛经以其作为宗教经典的尊严“抬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胡适,1928)。20世纪之交的白话《圣经》翻译对新文学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白话成为当时的文学标准语言。《圣经》语言个性和力量使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特有的“圣经引文”现象:输入了文学的非写实话语;改变了小说的叙事模式(杨剑龙,2001),引进了“书信体”小说、“牧歌体”诗歌和“祈祷”文学。两者对汉语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仅以汉字的增加为例,佛经翻译为汉语增加了35000个词;仅一部白话《圣经》(即1919年4月22日出版的“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就启用新的汉语表达法1000多条,新造的汉字多达78个(Loh Jin,1995)。

#### 四、圣经汉译与佛经翻译的差异

首先,佛经在中国的翻译没有受“征服文化”理念的驱动,自始至终以“使节文化”的面目出现。圣经汉译活动则不然。唐代和明清之际的圣经译介属于“使节文化”范围。然而,到了19世纪(基督教的“传教世纪”),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基督教新教兴起传教运动,推行征服全球的传教战略,助海外传教士翻译和传播《圣经》,英、美、德等国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的圣经汉译活动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策略扯上干系,遂有“征服文化”之嫌。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华人译者的主动参与,圣经汉译才重新纳入文化交流的轨道。

第二,以量而论,《圣经》文本与佛经文本不可同语。佛教翻译的组织形式是建立在等级之上的合作,“译主”的地位很高,有时由统治高层担任,译经高僧被称为“译经工匠”(菩提流支)、“翻经法师”(彦琮)、“翻经学士”(费长房)、“译经三藏”(玄奘)等,说明译者在佛经翻译事业佛教中的特殊地位。相比之下,圣经汉译不突出译者的个人地位,即使在翻译组织里,主席和成员之间地位平等,他们甚至采用机会均等的“投票”机制来决定最后的译文,可谓经文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差别同中西方的政治文化有一定关联。

第三,由于历史的缘故,佛经翻译无法拥有圣经汉译的时代特色。《圣经》在中国被反复翻译,经历了文言—浅文言—白话—现代汉语的更替,乃至出现“主流译本”(如19世纪的“文理<sup>③</sup>”译本)、“权威译本”(如“官话和合译本”)、各种“新译本”。重译《圣经》一直是中国翻译家的梦想;严复在1908年用文言翻译过《马可福音》片断;周作人在1920年公开肯定《圣经》的文学性<sup>④</sup>;郑振铎在1924年发表的《圣经的故事》一文里公开宣传《圣经》的文学价值,又在1935年提出重译《圣经》的计划;许地山(1921)、李荣芳(1930)、朱维之(1930)、吴经熊(1946)等中国翻译家先后重译了圣经诗歌名篇。到了新时期,张久宣(1987)翻译了《圣经后典》,文洁若(2001)翻译了《圣经故事》。进入21世纪,冯象(2004)、王汉川(2005)开始把《圣经》当作文学作品来重译。在当代中国,圣经汉译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读者群体也多样化,多种版本的《圣经》发挥不同文化功能,中、英文《圣经》甚至进入大陆的课堂。

最后,一个民族接受异域文化必然会有一个历史的消化过程。佛经翻译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佛经思想与中国哲学、文化、艺术、文学已经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圣经汉译活动虽然历时有日,《圣经》也被认为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一百部译作之一(邹振环,1996:36-41),但是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尽管有的学者如王晓朝(2003:237)认为,基督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亚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并将在中国文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囿于中国是个非基督教国家,任何宗教都不享有独尊地位这样的接受语境,以《圣经》为主要载体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还是有限度的。

#### 五、结论

发生在中国本土的圣经汉译和佛经翻译均有悠久历史,形成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两者都以汉语为依归,以传播本教教义、塑造本教教徒身份为主要目的,均受到中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反过来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圣经汉译和佛经翻译在中国语境下表现出来的相似性,首先反映出宗教文本的双重性,即文学与宗教混融一体这个世界大多数民族古代文学的普遍特征;其次,就对宗教经典的认知和接受语境而言,中国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国家。《圣经》和佛经在中国语境下均得到诗意的诠释,这说明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人读经传统对翻译成汉语的宗教文本发挥了重塑作用。两者的差异则反映出佛教来源地“印度文化圈”和《圣经》来源地“欧洲文化圈<sup>⑤</sup>”之间的巨大差别,折射出佛教文化的“使节文化”内涵和基督教文化的“征服文化”特点。在外来文化面前,中国文化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与外来文化积极互动,因文本而别,因文化而别,因时地而别。这正是民族文化自主和自卫的体现,也是不同文化之间得以平等交流的保证。

## 注释:

- [1] 近年从中国江苏省徐州挖掘的汉代石头画像上,发现了圣经故事和早期基督教图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为东汉元和三年,即公元86年,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上记载的时间(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提前了550年。参见王汉川译注《生命之光:〈约翰福音〉鉴赏指南》扉页插图“中国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及说明。
- [2] 昙无讖、鸠摩罗什、玄奘等用五言句翻译的佛经诗片断参见陈允吉、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3] “文理”(Wenli)一词由19世纪末华传教士杜撰,用来专指古典中文。随之出现了“深文理”(High Wenli即文言)和“浅文理”(Easy Wenli即浅文言)的区分。传教士圈外的汉学家并不接受这个词,中国人也未曾使用这个词。
- [4] 周作人于1920年在燕京大学作了题为“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后来这篇演讲稿加工成《圣书与中国文学》,发表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号,删去了演讲时的某些内容。
- [5]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以西欧的基督教文化圈、东欧的东正教文化圈、从北非到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印度文化圈和东亚文化圈来概括今日世界文化的不同类型。笔者以此阐发。

## 参考文献:

- [1] 陈富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 [2] 陈玉刚.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 [3] 陈允吉,胡中行. 佛经文学粹编[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4] 董秋斯.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A]. 1951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36-544
- [5] 冯象. 创世记:传说与译注[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 [6] 郭沫若. 《浮士德》简论[A]. 1947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35-336
- [7] 贺清泰. 圣经之序[A]. 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1949年版影印)[M]. 上海:中华书局,1949 19-20
- [8] 胡适. 佛教的翻译文学[A]. 1928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7-78
- [9] 黄夏年. 景教与佛经关系之初探[J]. 世界宗教研究,1996(1): 83-91
- [10] 季羡林. 序[A]. 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Z].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 [11] 蒋述卓. 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 1990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44-61
- [12] 李荣芳(译). 哀歌[Z]. 1930 李焯昌、游斌. 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99-211

- [13] 梁启超. 翻译文学与佛典[A]. 1924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2-67
- [14] 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5] 刘洪一. 犹太文化要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16] 吕振中. 译者自序[A]. 1946 吕荣安,《吕译旧新约圣经》的翻译过程[J]. 生命季刊(香港),2000(4).
- [17] 任东升. 圣经汉译研究:述评与展望[J]. 上海翻译,2006(3): 15-20
- [18]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19] 汤一介. 国学举要(佛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20] 王本朝. 《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建构[J]. 贵州社会科学,2001(1): 49-56
- [21] 王汉川. 生命之光:《约翰福音》鉴赏指南[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 [22] 王晓朝. 宗教学基础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23] 文洁若(译). 圣经故事[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24]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第二卷)[M]. 北京:三联书店,1982
- [25] 翁绍军(校勘并注释). 汉语景教文典诠释[M]. 北京:三联书店,1996
- [26] 吴经熊(译). 圣咏译义初稿[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 [27] 许地山(译). 雅歌新译[J]. 生命(月刊),1921(2-5).
- [28] 严复(译). 马可所传福音(第一章至第四章)[M]. 中华文史论丛,2000(6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8-73
- [29] 伊爱莲,等. 圣经与近代中国(蔡锦图编译)[M]. 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03
- [30] 尤思德. 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蔡锦图译)[M]. 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
- [31] 张久宣(译). 圣经后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32] 赵维本. 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M].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
- [33] 赵秀明. 佛经与中国翻译理论[D]. 天津:南开大学,2004
- [34] 郑振铎. 文学大纲[J]. 小说月报,1924(15).
- [35] 中文圣经新译会. 圣经(新译本)[Z]. 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2/1999
- [36] 周作人. 圣书与中国文学[J]. 小说月报,1921(12).
- [37] 朱谦之. 中国景教[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 [38] 朱维之. 对中国文化的两度外来影响的三次高峰[A]. 常耀信. 各种视角——文化及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73-81
- [39] 朱维之. 基督教与文学[M]. 上海:青协书局,1941

# 第三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

## 第二届全国旅游暨文化创意产业(多语种)翻译研讨会

### 征文通知

**宗旨** 应用翻译研究与实践水平关乎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速度和质量。本次研讨会旨在探讨全球化语境下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应用翻译教学与研究,应用翻译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的推广与实施;促进产业升级和持续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主题** 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应用翻译研究

**议题** 1.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应用翻译的理论体系与范畴; 3. 全球化与应用翻译理论创新; 4. 应用翻译教学与研究(包括教学原则与手段、课程结构与特点、教材设计与建设等); 5. 应用翻译实践(包括科技翻译、医学翻译、法律翻译、商贸翻译、金融翻译、新闻翻译、旅游翻译、社科翻译、会展翻译、广告翻译、公关翻译、影视翻译、艺术经纪翻译等); 6. 应用翻译语料库建设; 7. 应用翻译与现代技术; 8. 应用翻译与奥运、世博和 WTO等。

**应用翻译产学研成果交流展** 展览、展示、交流 2003年—2009年出版的应用翻译著作、撰写的科研项目报告、参与的社会实践成果等。

**主办单位:** 中国翻译协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承办单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地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时间:** 2009年10月17日—19日

**论文要求:**

一、凡欲参加者请在2009年7月30日之前寄500字左右的论文摘要发送至组委会筹备组电子信箱 [nsf2009@126.com](mailto:nsf2009@126.com), 并抄送 [tourcom@126.com](mailto:tourcom@126.com)。经会议筹备组初审后通知在2009年8月30日之前将全文发送至组委会筹备组电子信箱,9月中旬之前将寄达正式与会通知。

二、论文字数不超过7000字(含空格、标点),符合正式出版物的要求;格式同《上海翻译》;除正文外,务必包括中英文标题、摘要,中英文单位名称以及作者简介等各项(详见近期该刊)。参考文献的格式亦请参照该刊。会议拟出版专集(刊),择优刊登与会者的论文。

三、参加应用翻译产学研成果交流展的专家、机构,请于2009年8月30日之前将展览展示的应用翻译著作、科研项目报告、社会实践成果以及成果简介、作者简介等提交研讨会筹备组。

**联系人:** 袁连荣 周剑波 **电话:** 86-10-65778279 **传真:** 86-10-65778597

**主页:** 应用翻译研究网 <http://www.bisu.edu.cn/ssy/ShowClass.asp?ClassID=1027>

**博克:** 第三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 <http://blog.163.com/nsf2009@126/ediye.htm>

**E-mail:** [nsf2009@126.com](mailto:nsf2009@126.com), [tourcom@126.com](mailto:tourcom@126.com)

- 
- [40]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 [41] Baker, Mona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Z].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42] Bamstone, Willis.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3]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West: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Chan Sin-wai and David E. Polard (ed.)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89-392
- [44]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i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45] I Jin Loh.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A]. Chan Sin-wai and David E. Polard (ed.)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4-69
- [46] Lefevre, Andre.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47] Lefevre, Andre.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A].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re (ed.)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12-24
- [48] Nida, Eugene A. Theory and Practice [A]. Bruce M. Metzger and Michael D. Coogan (ed.) The Oxford Essential Guide to Ideas & Issues of the Bible (American Edition) [C]. New York: Berkeley Books, 2002: 494-497
- [49] Strandnaes, Thor.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nd Col 1 [M].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87
- [50]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